

福建地方志丛书

武夷山志

〔清〕董天工修纂

武夷山市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方志出版社出版

武夷山志

清·董天工 修撰

方留章 黄胜科 点校
邱培德 李 夷

武夷山市市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方志出版社出版

责任编辑:陈锦谷 李 贞

封面设计:郭志勇

武夷山志

[清]董天工 修撰

福建省武夷山市市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
方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丰台区北铁匠营 108 号 邮编:100075)

福建省建阳市印刷厂印刷

(建阳市民主北路 6 号 邮编:354200)

开本 850×1168 1/32 27.25 印张 660 千字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2000

ISBN 7-80122-248-2/K·74 定价:60 元

如发现印装差错,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点校清·董天工《武夷山志》前言

武夷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，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。市境内还有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武夷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。三星闪烁，山川增辉。

自古以来，武夷山就享有“奇秀甲于东南”之誉。汉武帝曾派遣使者献乾鱼祭祀武夷君。晋代迄南北朝，文士初涉山中者，皆诧为仙境。晋朝文字学家郭璞游山后所题诗句，被后人镌刻在九曲礁石上，称为题谶石。南朝顾野王、江淹分别赞颂此山为“千崖竞秀，万壑争流”和“碧水丹山”。这两人当时享盛名于闽中，前者被誉为“崇人知学，自野王始”，后者以“梦笔生花”的轶事独占风采。迄至盛唐，武夷山声名远播。玄宗皇帝册封天下名山大川时，武夷山跻身其中。朝廷特遣登仕郎颜行之到武夷山发布敕令，立有丰碑。五代十国时期，武夷山先后纳入闽国和南唐的版图。闽王皇叔和南唐皇帝的御弟都曾辞荣入道，进山修行。武夷山尽享皇室殊荣，声名弥彰。嗣后，道教把武夷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洞天，名曰“升真元化洞天”。赵宋立朝以

后，山中道观日隆。从北宋乾兴至熙宁末的半个世纪间，信奉道教的皇帝曾先后遣使到武夷山降香，投送金龙玉简多达20次。南宋时期，儒学进山，大放异彩，有“三代之下孔子”之称的朱熹在崇安县(今武夷山市)五夫里定居50年。他“去武夷一舍而近，若其后圃”，并在武夷山五曲之畔构建武夷精舍，授徒讲学，著书立说，奠定了朱子理学的根基。山中佛教亦鼎盛于唐宋，寺庙连绵，梵音清越。儒释道三教荟萃的局面造就了武夷山的独特地位。嗣后千百年间，三教鼎盛、并存争荣的局面久盛不衰：曰儒，则有康熙皇帝亲赐紫阳书院匾额“学达性天”，武夷遂被誉为“道南理窟”；曰道，则有号称“武夷巨构”的冲佑观，著名住持江师隆曾被宋理宗敕赐为“金门羽客”；曰释，则有雄踞武夷中枢的名寺“天心禅寺”。山中书院林立，寺观巍峙，弦诵琅琅，钟鼓悠悠，名人荟萃，胜景益臻奇秀，自然人文景观咸备，诗词歌赋俱美。这些林林总总，备载于自宋代以来陆续编纂的《武夷山志》中。按，自宋代刘夔始纂山志迄于清代董天工《武夷山志》（下简称董志）问世，共纂山志14种，但多已散佚。现存4种山志中唯董志最称美善，被公认为武夷山志中之出类拔萃者。

董志修撰于清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，两年完稿，第三年付梓问世。今北京图书馆和厦门大学等图书馆存有乾隆原刊本，弥足珍贵。董志在历代武夷山志中最为晚出，在编纂过程中，作者借鉴前人成果，吸取精华甚多，故在诸多武夷山志中体例最为完

备，内容也最丰富。问世以来，一直被游山者奉为圭臬。遗憾的是，由于世事沧桑，原版久已散佚，此书遂告遁迹。事隔近百年之后，在朱熹定居地的崇安县五夫里，有识之士罗良嵩矢志弘扬乡土文化，拟将董志重刻付梓，并已写好序言，终因“手泽空遗”而在生前未能如愿。18年后，其长子罗才纶克承父志，在广州任上将董志重刻付印，遂使董志流传至今。这段轶事载于点校本卷首罗良嵩撰写的《重刻董典斋先生〈武夷山志〉序》及其后裔为此书再版所撰《跋》之中。《序》文称：“董典斋（按，天工号典斋）辑志二十四卷，采讨既周，体裁悉当，较诸家更为详备。嗜卧游者欲购其书，卒未能得，盖原版之散佚久矣！”《跋》文道：“先将此书就近在羊城刊刻……聊以了夫未竟之绪，非敢云克承先志也。”重新镌刻的董志书版至今仍珍藏于武夷山市文化馆。50年代，崇安县文化部门曾用该版在北京重印数百册，内部发行。80年代初，崇安县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。为适应旅游、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的需要，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与福州市古籍书店又联合影印董志千余册。出版后也早已售罄。时至今日，武夷山旅游业方兴未艾，中外游客逐年猛增，人们亟望挟书细游，按图索骥，或夜读山志以继白日之游兴，或吟咏玩味唱和古人之佳作。为此，我们在编纂新《武夷山志》之余，即着手进行董志的点校工作，俾使董志点校本能向广大武夷旅游者、导游员、武夷文化研究者、武夷诗文爱好者以及地方志工作者展示山中丰富

多采的自然、人文景观和广博精深的武夷文化内涵。

董志的编纂者董天工，字材六，号典斋，崇安星村曹墩人，书香世家。他先后任福建宁德、湖南新化、台湾彰化司铎、训导和山东观城县令，后因服丧回乡，遂选择武夷山隐屏峰下构建望仙楼，与其父董茂勋构建的留云书屋毗邻，书屋坊门至今仍存。董天工留居山中遍览武夷名胜，搜集旧志诗文，就其所亲见者详加考订，并细绘山图、绣像及山中主要建筑如冲佑观、紫阳书院等，图文并茂，汇为山志，共8册24卷。志书详细叙述武夷山水的形势、特色和名山历代所受敕封、颁赐；介绍历代到过武夷山的诸多名贤、官吏、隐逸、名释、羽客；记录古代建筑的兴废更替；展示山中古迹、物产以及游山诗文等。这些为对研究武夷山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，对进一步认识和开发展武夷山风景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依据，对修复山中的著名建筑也提供了足以征信的蓝本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董天工对武夷山“三三六六”的特色赋予了实际的意义。“三三”得九，指潋洄群峰的九曲溪。他考辨历代山志对九曲溪每一曲界定中的讹误，作出精确订正。“六六”三十六，指山中出类拔萃的三十六座名峰。历代山志对此仅是虚写而未能指实。董天工则根据民间口传和历代文人的确当品评，指实了三十六峰峰名。他在《凡例》中写道：“三三六六，其名已久，诸志无有指实其数者。今搜订参酌，备载于形势之内。”此举为武夷山水补充了一道流传万世的异彩。董氏倾心武夷、力著山

志，功不可没。他还著有《金山志》、《焦山志》、《笺注石鼓图记》、《游九华诗》等山志、游诗以及理学著作《广集春秋繁露》。董编《武夷山志》完稿后，丧服已满，赴京补河北香河县令。他敬请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史贻直、户部尚书蒋溥以及建州刺史史曾期等人作序，诸名宦均乐而为之。卷首序文共8篇（自序不计），洋洋洒洒数千言，对此书褒赏有加，赞誉董氏“其有功于名山、接迹前贤，信可以不朽乎！”董天工任河北香河县令期间，为拱卫京津中枢建有功绩，升任安徽池州知府，逝世后葬于武夷山幔亭峰之麓。其墓至今尚存，被列为武夷山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点校董志，我们倾注了很大精力，并敬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卢美松副主任对全书进行审阅、校正，力求严谨准确、完整无误。由于我们据以点校的董志重刻本，或漫漶，或残缺，或由于书匠、刻工的疏误，致有舛误疑难之处。为此，我们参阅、对照了董志据以修撰的四本书——明袁仲孺《武夷山志》、徐表然《武夷志略》、清王梓《武夷山志》和王复礼《武夷九曲志》，审慎点校：文字方面，除个别容易引起歧义，非用繁体字不可外，一律采用国家正式颁行的简化汉字；在处理繁体字、异体字、生造字、通假字、错字及避讳字时，以《康熙字典》、《辞海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）为依据；在句读与分段中，字斟句酌，反复推敲。董志重刻本中有同一人名而前后写法不一者，则

参阅有关人名辞典予以订正，三处不易发觉的错页也做了纠正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疏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。

武夷山市市志编纂委员会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

原 序

山水之乐，人情所同，顾或者闭户不出，纵览于山经地志而托之卧游，无如何也。

独余自三十岁迄今四十年中，持节遍天下，凡名山大川，如滇之点苍、粤东之庾岭、罗浮、秦之华岳、楚之衡山、豫章之匡庐，以至江乡之钟山、濡皖金焦诸胜，皆奉简书、拥旌钺以坐镇其间，或与僚佐相宴游，或风尘鞅掌一过弗顾，而所尤耿耿于怀弗能释者，则闽之武夷。

考武夷之迹最古，其所称武夷君、圣姥诸事，多荒诞不可信。六朝时，自顾野王讲授其中，文学以显。至宋，赵清献筑吏隐亭于三曲，其后杨文肃、胡文定倡道于此。及朱子开紫阳书院，诸大儒云从星拱，流风相继。迄元明以至于今，而闽学集濂、洛、关之大成，则皆讲学此山者，而山之名遂以甲于天下。

余以己酉、庚戌再莅七闽，闽山之灵秀，将一蜡屐寻幽于三三六六间而未果也。曾能始名胜志而外，欲得山之全志读之，则自刘道元以下十余家，板多散失，其仅存者亦阙略、漫漶无善本，所见刘斧、谢肇淛、钟惺、吴棫诸人游山记，益艳慕之。

时高文良官制府，同年刘艾堂为观风使，及门戴巨川督学政，彼此觴咏唱酬，多及武夷之胜。余于其暇，辄拟征聘文人才士一辑全志，以标兹山胜概，亦守土者所宜有事也。会奉诏开闽两江，则

其志又未就。

今年春，族侄曾期方守建宁，邮寄汇志一编，则崇安邑绅董子天工所编辑也。余披之，部帙哀然，而删繁补缺，纲举目张，序次井井，不啻身亲历览。适董子赴铨造谒，复述原委，请序于余。余既喜山之全胜毕备，且乐董子以吏治闻，而又具有此良史才，以克成余向者游既不果、书又未就之志也。独念文良已没，而艾堂、巨川皆老病于荒江茆屋间。黄公酒垆之叹、庐陵师鲁之志，不禁茫茫交集也。序成，为感慨系之矣。

时乾隆十八年仲春月。经筵讲官、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、兼管工部事务、加四级军功、加二级，溧阳史貽直撰

原 序

余自弱冠登朝，凡二十余年，其间恭膺简命，曾一校士于两浙，旋又拥节钺于湖南。每遇山川佳处，虽舟车劳顿，未尝不登临眺望，酌酒赋诗，以不虚其所历。然终以宇内名山大川足迹未届者无穷，时时萦诸寤想间，而闽之武夷其一也。

夫武夷之在闽，殆与岱宗之在鲁，太华之在秦，嵩少之在豫，岵嵎之在荆，峨嵋之在蜀，天台、雁荡之在浙，黄山、白岳之在徽，罗浮之在粤左，匡阜之在西江，同为一方之表镇而群山之眉目也。况在赵宋之世，恒为巨儒所托足，龟山、屏山、晦庵、九峰，一时讲学之盛，不下鹿洞、鹅湖，则又不仅玉女、晴川、仙坛、佛地，为足供竹杖、蓝舆流连吟赏而已。乌可不专辑一书以发扬奇胜、表著往迹哉。

昔之为之志者，自刘道元以暨王草堂诸公皆有纂集。而此详彼略，且多残阙，是以余尝神想武夷而曾不得全篇，以恣卧游，盖风流之歇久矣。

今年春，香河令董子天工谒余，道故之余，出此志囑序于余。余披而读之，见其中川、岩、洞、壑、楼、观、亭、台、圣贤、仙佛、碑记、韵歌、铨次、部居，纤微毕具。令我不啻身亲九曲，

登幔亭而涉云涧，游精舍而肃前型，是董子之能挟以俱来也。非其善承先业、殚竭披讨之力未克臻此。余故乐为之言，一以贺武夷之胜概得斯志而益彰，一以庆董子之书成将并之而不朽，且以为四方人士生名胜之区有志于纂述者劝焉。

乾隆十有八年，岁次癸酉嘉平月之望日。赐进士第、经筵讲官、太子太保、协办大学士、户部尚书、世袭一等轻车都尉、加一级、南沙蒋溥书

原 序

自载籍既博，山经水志不下百余种。其最著者如《名山志》、《南康记》、《郡国志》、《临海记》、《广州记》、《南雍记》、《吴地记》、《始兴记》、《五岳图》、《荆南图》、《秦州记》、《十道志》、《兖州记》、《九华山录》、《武陵记》、《隋图经》、《宣城图经》、《益州记》、《神境记》、《南徐州记》、《庐山记》、《湘中记》、《续南越志》、《宜都记》、《括地图》、《洞天福地记》，莫不探幽索险，绘异搜奇，泄鸿濛之秘而显诸目前，诚巨观也。

独怪武夷以巖芳伟嶂镇七闽，而诸书见称绝少，得无如《名山》不载九华，《水经》独弃巢湖，有遗慨耶！及读南唐张绍《会仙观铭》与宋吴拭《冲佑观铭》、祝穆《武夷山记》，然后知赏之者大有人在。

又按，《汉书》“祠武夷君以乾鱼”，《天文志》“武夷星分牛宿”，是知武夷之重更不自唐、宋始也。

因思此山秀结天壤，有宋名贤后先踵接，析疑辨惑于其间，山灵固自不凡，其不借中秋宴客，二子名武、名夷之说，以惊世而骇俗也明矣。第虑积久帙散，古迹难名，来者徒诧为仙窟神宅，而不知为鹿洞、鹅湖，甚可惧也。

原 序

自昔名山胜境必因人而传。庐山秀甲天下，然必前有匡续，后有朱子，而后香炉、五老诸峰，始与嵩、华、恒、霍并峙于天地间，为艺林所记载，争与歌咏，爱慕之而不能已。

闽之武夷，亦为东南山水秀异之地。当晦庵讲学崇安时，自辟精舍，令诸从游者诵习其中。亦惟是山闲静远，少避世纷，与二三子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，非必耽玩溪山之胜，与谢公展履同疲敝于清泉、白石间者比也。生其后者，于昔贤琴剑栖止之区，一草一木皆足令人流连忘返，勿剪而勿拜。况武夷九曲，其境致足以移人，宜乎闽之士大夫规模形势，修建亭榭于其地者，远近相接。于是乎，名胜之多，土膏之厚，茶荈竹木之清佳，以及骚人游士之吟咏，外而道书方士及云蓝香梵之所寄托，不可胜纪。汇而集之，裒然成帙矣。旧志已四种，未为全备，董生天工惧其久而失实也，爰編集散佚，合为一书，立纲分目，瞭然可见。夫以董生之勤，知其志趣所在。庶几日进不已，师其乡先辈之立心制行，以自检束。

昔人山经海志每搜集奇诡，征引繁富，俾观者洞心骇目以为快然，返之于身，毫无裨益，是非董生之志也。董生两任司铎，晋观城令，有声政谱。向尝读书大学，从余游，知之最悉。今抵都赴补，阅志而喜其志之可嘉也，因书于是策而归之。

时乾隆十七年仲冬月，经筵讲官、协办大学士事务、吏部尚书、教习、庶吉士、加三级，合河孙嘉淦撰

原 序

宇宙山水之灵异，每因人而著。尼山以宣圣而得名，濂、洛以周、程而衍派，海内名山，因人而著者不可胜数。盖地灵而后人杰，亦人杰而后地益灵耳。

崇之有武夷，自开辟以来，天造地设，其山之嵒崎险峻，水之曲折潏洄，若鬼斧神工，莫可窥测。海内山水之灵异，于斯为最。

然自秦汉而降，历为方士、羽客隐遁之所。迨宋儒迭兴，考亭夫子倡道东南，讲学于武夷之五曲，而胡、杨、游、蔡诸大儒先后往来，以及文人词客游览觴咏，流风余韵，大为山水生色。而武夷之名始甲于天下，谓非人杰而后地益灵耶？

余巡视兹邦，恒以公务倥偬，不获穷搜奇奥。检考旧志，又皆残缺简略，每以不能尽揽兹山之胜为憾。庚午秋，再摄郡篆，适崇邑董君典斋升迁东鲁观城尹，缘丁内艰，读礼家居，慨然汇编山志，而远来问叙于余。因言旧志有四而板存其一，故多缺略不全，今汇辑四志而合为一志，删其繁芜，补其残缺，凡前贤歌咏，编次于名胜之后，以便披阅。其星野、形胜、祀典、颁赐，与夫山图、古迹、名贤、艺文，条分缕析，纲目备举，隶为若干卷。兹编之作，使观者披图阅志，如身历其境，尽揽胜概。洵名